

三代同堂的用语

郑惠芳

联合早报，2011年1月2日

从没试过三代同堂，从小爷爷奶奶不同住，外公外婆生前住怡保。小时候，语言环境单纯，在家讲广东话，出外多数拜访嬷嬷叔叔伯伯姑姑，也讲广东话。邻居虽然只有正对面的是广东家庭，其他邻居都跟我们家小孩子讲广东话。晚饭后在餐桌上写功课，眼睛看书本，耳朵则听着“丽的呼声”里李大傻讲广东鬼故事。夜里从房间门缝跟姐妹弟弟人叠人偷看的电视节目，也是讲广东话的香港连续剧。那时住大巴窰一房半厅，邻居多，也靠得近，对面是广东阿嫂，过了楼梯口住有妈妈口中的“上海婆”，印象中还有客家人和福建人，因此虽然走廊上萦绕的音韵夹杂多种语言，但印象中没有沟通的问题，但不管多努力想，却总想不起我们到底跟邻居的小孩用什么语言交谈。

上小学不久，国家开始推广讲华语运动，家庭语言不知不觉起了变化。我们五个懵懂小孩在学校初识“母语”与“方言”，再把信息带回家。记得非常清楚，有一天妈妈说大家要在家多讲华语。而没正式念过书的她，竟然很快就学会了简单的华语会话。爸爸由于打的是家庭工，天天见的是亲戚熟友，工作和家庭语言仍以广东话为主。这跟语言人类学家苏珊·齐（Susan Gal）于70年代末在匈牙利做田野调查时所观察的情况类似，就是女性往往引领语言潮流，率先接受并使用外来的、社会地位较高的语言，以便为自己争取更高的社会地位，而这一般出现在男女不平等的社会里；而男人则多半较安于现状，通过坚守语言习惯来巩固自己在家中或社会的地位。另有研究提出，男性（特别是年轻男性）也可能借由使用“非官方”语言来显示自己的男子气概和叛逆。我想我爸纯粹是因为工作和生活环境并没迫使他一定得改变使用了大半生的语言习惯。多年后在我的田野调查中，也发现跟他一样的例子。

我爸最后还是顺应了时局。那一阵子，从美国拨电回家，好不容易盼到有人跟我讲广东话了，怎么知道一句广东话过去，回应的却是华语，心里是无奈又好奇，不知道我爸在这把年纪为何转换语言习惯。后来有机会问他，原来他退休后跟我妈参加邻里乐龄活动，让他有更多机会接触到这个官方母语，再加上我妈已习惯在家讲华语，老爸的退休新生活不知不觉就被华语占据了。另外，五个子女中有三个不是嫁广东人，同种不同宗，华语顺理成章成了共同的沟通语。

而我妈呢？她更厉害了，除华语外，她现在讲福建话比讲广东话更溜！因为她参加的乐龄活动中，有许多讲福建话的婆婆。社会语言学的研究也发现，人到老年，往往会在语言上“返璞归真”，用回自己最熟悉舒服的语言，而不需要再为谋事谋人而使用官方或工作语，男女均同。我妈碰到的婆婆们是一例。我妈再过十年，不晓得会不会讲回广东话？

新加坡语言环境复杂多变，不停地对说话的人、听话的人和回话的人施加语言本身以外的种种符号价值，也常负载满满尊严。长期处于这样的话境，多少造就新加坡人不善辞令的表现。田野调查中就有受访者说，因为经常得考虑听话人对自己的语言选择作出何种反应和评价，为了避免产生误会，索性不开口。生活中也经常发现，这里人们喜欢用肢体语言来表达，更甚者选择对眼前发生的事视若罔闻，身不侧、眼不视、口不语。人际磨合，造就这般的都市文化，语言到底扮演了多重重要的角色？

那年跟论文指导教师谈起爸妈的语言变迁时，她听得津津有味，鼓励我往这个方向设计博士论文题目。我的论文于是探讨三代同堂家庭的语言习惯以及语言遗产的传承。语言政策如同其他政策，其一着眼点在于调整民众行为与思维，以便民政一心，朝往最符合国家及多数民众利益的方向前进。回国后跟人谈起论文，有人曾问为何要浪费时间去探讨一些即将死亡的语言。国家语言政策深入人心已是个事实，然而，语言习惯和态度往往有其双面性，露于表的态度未必就接得上长期积累的习惯与蕴于内的信念，而语言人类学者热衷研究的，就是两者之间的差异。这些差异除了告诉我们国家政策的受落程度，更重要的是，让我们了解行为与思维的转承过程。在三代同堂家庭里，因有嬷嬷爷爷维持或回归单语习惯，子孙传承语言遗产的机会较高，这里不单是生活沟通所需，也是因为家族语言灵活性较大，没有让语言政策完全转换或被冠以负面价值。政策未完全渗透家庭，语言遗产仍然有生存空间，但这并不代表语言政策失败，反映的应该是社会的张力和包容性，以及语言生态的生生不息。

（作者是语言人类学者、政策研究院研究员）